

DOI: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2.0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逻辑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演变的线索

秦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改革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经历了选择、坚持、深入发展、完善几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几个标志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逻辑关联。为走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困境,中国改革在实践中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对原创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发展与创新,邓小平理论就是理论创新的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发展下去,既需要在生产关系层面做相应的调试,也需要在上层建筑层面做些调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社会政治关系层面认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人们利益地位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为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清除了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原生态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科学发展观通过发展理念和基本要求的转化,来规制原生态市场经济的弊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社会主义将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7)02-0126-09

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其间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世界所公认。中国改革在实践领域的最大成就就是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手段,使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在理论层面的最大贡献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经历了选择、坚持、深入发展、完善几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几个标志性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演进历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发展,学界分别给予了高度的理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学界还鲜有论及。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标志性成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演进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存在内在关联。可以说,认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十分明晰的认知线索。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时代拒斥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反映了历史的必然。首先,从实践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经济体制上要求计划经济与之匹配。林毅夫等人认为“70年代末以来中国所对之进行改革的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无论是理解传统经济体制,还是回答改革的策略和前景,了解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这种逻辑关系和历史顺序都是必要的。”^{[1][20]}因为计划经济是“看得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的,它能有效引导有限的资源快速流向重工业,而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资源流动靠利润引导,重工业因其自

收稿日期:2016-12-09

作者简介:秦超(1987-),女,山西晋城人,法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身具有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利润率低等特点,在市场经济中很难得到资源的“优先关照”。当然,实行这样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肯定也与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有关,“这种经济机制变化和苏联式发展战略的推行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提出了二者的相互关联问题。”^{[2]53}其次,从理论层面看,当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是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未来社会商品经济要消亡,其逻辑是:其一,商品经济存在的所有制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在运行中会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这两大问题;其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制取代私有制是解决两大问题的根本之道;其三,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制使得人们的劳动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这是商品经济消亡的条件,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3]303}其四,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会被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所取代。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条件下,“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303}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中,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自然失去了其合理性。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顺理成章。在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中,即便是在特殊时期和特别领域需要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商品交换原则时,也都是小心翼翼地予以种种限制,诸如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为了解决两种公有制之间产品交换问题而运用的商品经济方式、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独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对商品经济的认可,都对市场经济采取了原则上否定、策略上有限运用的态度。^[4]

总体上看,在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前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一度分别被贴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签。尤其是对中国而言,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做了重大调整,中国共产党认定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展开的中苏论战更是提升了人们

对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守的自觉意识,进而强化了人们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邓小平选择市场经济面对的最大理论难题就在于此。

驱动中国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实践领域。20世纪下半期,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几个新变化,一是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二是发展模式的变化,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的“古典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凯恩斯主义”发展模式所取代,这种发展模式将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充分结合,一定程度遏制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期。三是发展动力的变化。以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在西方国家普遍兴起,这种技术革命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它与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显现出勃勃生机,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取了普遍的社会福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资之间的对立。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却日渐式微,现实迫使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这两大现象判断资本主义即将走向灭亡,马克思在1875年曾指出“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5]139}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又进一步断言:资本主义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6]443}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判断多少有些过于乐观。

当中国从“文革”困境中走出来之后,发现远远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甩在身后,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再按照原有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走下去。在实践层面,只有借助市场经济手段,才能实现在生产力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在理论层面,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两难之间,邓小平选择了前者。实践上选择市场经济,理论上必须进行一系列突破和创新,邓小平理论就是理论创新的成果。

改革启动之前,邓小平完成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后面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

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7]236}这可以看作是突破计划于市场束缚的理论预演。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定位为手段,剥离掉长期附加在它们身上的“姓资”、“姓社”的制度属性,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标志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其他基本理论支点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内在关联。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客观上要求一定程度上存在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形成不同的市场主体)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规避可能的理论风险,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一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可以运用“市场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再如,社会主义本质论,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邓小平从生产力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价值目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来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本质,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来完成。还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不可分:改变贫穷落后状态决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必然选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完成,为了使改革开放不至于偏离社会主义航向,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动摇。另外,为了避开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姓资”、“姓社”困扰,为市场机制发挥赢得时间,邓小平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不争论”原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架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三个有利于”是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它们都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衍生物。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选择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持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生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具重要意义的转型。因此,不能仅仅只看它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的改变,还应当看到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

方面的变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社会阶级结构的演化,这种演化表现为三个阶段: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时的“阶级对立是简单化了”^{[8]273}的。而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继续推进,阶级结构会发生变化,“若干中间和过渡阶级使原本明晰的阶级结构的界限规定到处都模糊起来”^{[9]1001}这是社会阶级结构演化的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整个社会再分化为资本家、“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差别又回归清晰。当然,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演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变革情况,两者的社会性质不同,但是,若从经济体制层面看,二者还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前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对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至少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看到,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运行只有10年时间,如果再算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总共不过20多年时间,在带来财富总量的快速增加、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领域的差距拉大和社会结构方面的阶层分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必须正确回应的两大难题。

首先,从收入差距问题看,市场经济因其“优胜劣汰”机理的存在,一般会导致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财富分化,不管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莫能外。^[10]这一点邓小平发动改革的时候也有过预判,他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还反复强调“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这个“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不好明确界定,不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允许长时间财富分化的存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1]374}。但从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看,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十年、二十年能够实现的,先富者积累资本使他们能够帮助后富者,后富者获得帮助,赶上或接近先富者,往

往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中国很难规避较长时间的收入分化。

其次,从阶层分化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引发了阶层分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阶层的出现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有着必然联系。阶层分化的同时,伴随着民营经济逐渐崛起的事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民营经济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新阶层群体所做的贡献也日益突出,这个群体虽然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11%左右,但却掌握着超过10万亿的资本,也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且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上述两大问题,不仅超出了原创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而且也不是仅仅把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发展手段能解释通的,因为这一手段如果不能带来共同富裕,如何能体现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优越性呢?可见,江泽民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两难抉择:从共同富裕的目标看,需要适当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看,还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机制的活力,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下去,这不仅需要在经济方面继续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还需要在政治层面认同新阶层的地位,以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种两难选择,其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继续推行“不争论”原则,还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发展下去,这不仅要完成所有制和分配等方面的经济关系调整,也要适当进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

在实践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选择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坚持下去这一方案,并在理论层面不断进行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分配关系,由此十五大也同时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至党的十六大,在分配关系上又提出新的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2]550}同

时,十六大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要在全社会贯彻落实“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目的是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障碍。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还正式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原有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将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阶层都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中来,认定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做的贡献,修改了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先进与否的标准,允许新阶层中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这是一次较为大胆地理论创新,以至于在理论上一度招来一些非议。这种理论突破很有必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社会政治关系层面认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人们利益地位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为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再次清除了障碍。

可以认为,在实践中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需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冒着一定的理论风险、接受各种质疑也要把市场经济这条道走下去,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许多国家和民族采用这种经济体制快速摆脱物质匮乏的落后状态而走向繁荣,这种高效率的体制似乎对中国社会主义特别眷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绩效让全世界震惊,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中国就告别了物质匮乏时代而渐趋繁荣。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平稳运行状态。事实表明,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抉择。

市场经济虽然是一种高效的经济体制,但并不能称得上完美,像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市场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说既有“天使”的一面,又有“魔鬼”的一面,它在带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

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也暴露了它自身的缺陷:它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下,人们很难遏制从自然界不断获取财富的冲动,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异化了个人与自身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13]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但并不能够完全规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初创时期并未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形态,给人的印象是“市场经济带着社会主义走,而不是社会主义带着市场经济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数年之后,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伴随着GDP崇拜、贫富差距拉大、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多发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中国改革就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也充分暴露出市场经济“魔鬼”的一面,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加强生态治理和完善社会福利来延缓这些危机,但这些举措时间战线较长,治理成本过高,不是化解危机的根本之道。社会主义者要想将市场经济这条路走下去,必须找到一条破解发展难题的新路,这条道路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绩效,又能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上。科学发展观就是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难题而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4]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15]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其现实针对性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基本架构的基础上,更好规避其负面效应,体现社会主义目标和要求,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时期的“市场经济带着社会主义走”,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带着市场经济走”。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意是发展,实质上就是要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下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要想展示其优越性,必须尽快实现生产力方面的超越,这样才有完成其他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6]^[14]从以人为本的意涵看,它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始运行阶段出现的“GDP崇拜”的纠偏,也是为了遏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在运用市场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将发展成果拓展至全体人民群众共享,这就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完全一致,确保了市场经济在中国运行不至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具体解释“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7]^[15-16]由此可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初始阶段发展中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针对的是我国阶级社会发展中的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等问题,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从全局出发,兼顾各方利益,实现经济社会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根本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方法。

科学发展观是对原生态市场机制的修正,针对的是如何科学对待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度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过分张扬工具理性至上,以至于形成“物本主义”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如果长时间得不到修正,人在物的面前将变成僵化的机器。正如弗洛姆所言“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18]^[20]由此观之,科学发展观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深入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人类对原生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畸形发展的批判与反思。

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提出的第二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并且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或者说它本身就属于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发展方面的要求,这一目标的提出同样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突出密不可分。它既是化解市场经济自身的理性失衡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需要。^[19]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依靠竞争机制起作用来配置资源,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源会向竞争能力强的一方流动,其结果是优胜劣汰,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对立。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社会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发展失衡和社会对立的反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管控市场经济自发发展趋势方面的作为:一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

邓小平时期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试验,确认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江泽民时期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下去;胡锦涛时期通过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来化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对市场经济进行选择、建构和调试,这个过程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并没有完结。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体现在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更体现在新一届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前面的逻辑,习近平时期要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果的集中展示,表明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初步实现共同富裕

自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状态”这一概

念,到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间经历了33年时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绩效越来越显著,中国共产党对“小康”目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把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至党的十六大之前,我国胜利完成了“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这一目标。但总体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因此,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¹⁴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这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平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序推进,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再一次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代原先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态建设等5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拓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确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21]³¹⁴;二是强调“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三是强调“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22];四是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一步提升,是因为我们有发展的成果做支撑,而这些成果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的。市场经济尽管会带来贫富分化、环境危机、发展失衡等问题,但它并非是一匹失控的野马,只要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得好,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综合工程中不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试与校正,使之运行更健康;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果的检验,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初步实现共同富裕。

2.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之更加成熟和定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和此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定位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意味着此前是把市场经济当成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此后则是把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要遵循这一规律。正如习近平所言“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21]76-77}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规律意义上运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并且开始致力于完善这种发展方式,使之更加成熟和定型。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六大体制改革。既然要形成一种比较成熟和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仅仅是经济体制领域的深化改革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还必须同时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配套改革。

从总体上说,中国改革的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展开,后一阶段主要是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展开,前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好,后一个问题正在解决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只强调市场调节,政府只是“守夜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强调市场调节作用,又强调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尚不完全清晰,政府往往存在“越位”或“缺位”的情况,影响了市场职能的发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就廓清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边界。市场机制呈现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拉开差距”的趋势,政府作用应体现在“全面协调——促劣变优——共同富裕”上,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扬长避短、相得益彰。从一定意义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

3. 全面依法治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正因为如此,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全面依法治国,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23]12}

市场经济对法治的依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要有法律依据,并且各类市场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样市场的公平交换才能得以实现;二是环境需要法律来维护。马克思认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6]423}这说明法律因交易而产生,市场竞争的公平有序需要法律来维护;三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行为也要有法律来规范。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要和政府作用相配合,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市场主体要受法律约束,政府行为同样要受法律约束,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政府依法行政做了强调“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23]15-16}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24]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对法治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和必然要求。“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25]511-512}有了法治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有序运行,才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日臻完善。

4. 全面从严治党消弭市场经济对党的肌体造成的不良影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市场经济天然具有两面性:它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在以它的原则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和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非商品化的东西都有可能转化为商品,许多不能用来交易的对象被用来交易。一旦商品形式泛化,它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26]150}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决定了中国改革必须注重两个向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

自身规律,为市场经济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另一方面,为防止市场原则泛化,改变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侵害执政党肌体,还要为市场经济立法度、立规矩。

市场经济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坚持个人主义价值观,张扬的是个人利益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张扬的是奉献精神 and 整体利益的实现。党的原则、宗旨和目标与市场机制并非完全一致。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在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作风等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固然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市场经济肯定脱不了干系。市场经济不但开辟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而且有可能使交易原则泛化,导致权力滥用。一旦权力“物化”为资本,就必然受市场原则摆布。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7]402}在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1]379}十四大后修改党章,把“坚持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就是为了规避市场经济对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侵袭和对党的肌体的侵蚀。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改革之初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可能造成的冲击,但还是没有预判到其负面影响会这么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利原则和交换原则改变了部分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和价值制度,个人主义泛化改变了部分党员干部的集体主义观念。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方面一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道德滑坡、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先锋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处在核心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会断送党和国家的前程。

应当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运行以来,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注重新场域中的自身建设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将管党治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双管齐下,二者一柔一刚,同时、同向发力。思想建党放在首位,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有些党员干部行为上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思想上先出了问题。制度治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制度是党的组织的基础,而制度化是党产生组织力量的关键……在现代民主政治下,提

高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是聚合和积累其组织力量的重要途径。”^{[27]8-9}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指出制度治党的重要性,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权力滥用、钱权交易等现象,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于全面从严治党,在制度治党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消弭市场经济对党的肌体造成的不良影响,又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结语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主要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以及能不能结合好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时代以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实践为依托,以勇敢地创新精神为市场经济“祛魅”,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的问题。江泽民时代不仅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而且从政治层面认同了新阶层的地位,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度结合。胡锦涛时期,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市场经济进行校正,使之更好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不断完善。直至今日,人们欣喜地看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过多年的磨合,正在向“能结合好”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形态,社会主义将借此超越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当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 [1]林毅夫 蔡 昉,李 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波]W. 布普斯 k. 拉斯基. 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M]. 银温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余金成.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大理论基石的逻辑生成[J]. 学习论坛,2013(2):12-14.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63.
-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0]林志友.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J].社会主义研究,2008(6):15-18.
-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赵智奎.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5]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1).
- [16]王伟光.科学发展观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8][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19]欧健.市场经济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J].理论月刊,2010(3):15-17.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2]习近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N].人民日报,2013-09-01(1).
- [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4]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4-05-28(1).
- [25]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6]卢卡奇.阶级和历史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7]林尚立.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QIN Chao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including selection, persistence, depth development and consummati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also formed several landmark achievements involving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the four overall strategic layouts”. Th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traditional socialism pattern, China chooses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reform practice and develops and innovates the original socialist theory. Deng Xiaoping theory is the fruit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not only needs to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at the plan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needs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at the plane of the superstructure as well. From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the “Three Represents” important thought identities with the changes of people’s benefits, status and economic relations caused b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removes obstacle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depth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rings about both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a lot of drawbacks of original ecological market economy. Scientific outlook regulates the defects of original ecological market econom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idea and basic requirements.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 promotion of the “Four Overall” strategic layouts has consummat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ism will achieve its own value goal on that basis.

Key words: socialist marketing economy;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Four Overall” strategic layouts

(责任编辑 徐冰鸥)